



Sino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cademic Studies Series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

张志刚 卓新平 总主编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

CHRISTIANITY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CHINA

卓新平◎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Sino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Academic Studies Series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

张志刚 卓新平 总主编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

CHRISTIANITY AND CULTURAL CONTEXT IN CHINA

卓新平◎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卓新平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5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张志刚,卓新平主编)

ISBN 978 - 7 - 80254 - 720 - 9

I. ①基… II. ①卓… III. ①基督教 - 关系 - 中华文化 - 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143 号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处境

卓新平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秀秀 sue68@aliyun.com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300 千字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720 - 9

定 价: 48.00 元

鸣 谢

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总序

“基督教中国化”的话题是中国政界、教界和学界都非常关注、而且也颇有争议的论题。

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从其历史发展沿革来看乃是两种文化体系相遇和对话的关系,当然也是两种强势文化彼此接触和对比的关系。从历史到现今,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都被认为是不同的传统或传承,而且二者各有代表、各具特色,似乎尚没有真正走到一起,更谈不上有任何重要、关键性的叠合或结合。在中国人的眼中,基督教好像与西方世界有着密切关联,基督教文化也往往会被视为西方文化、至少是代表着西方文化。而中西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虽有对话、更多冲突,双方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复杂经历和双边关系上的起落反复,亦使不少中国人在认识基督教时产生了隔阂,形成了距离,相互在了解上也交织着许多误解,留下了种种敏感话题。因此,基督教的东传、其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一直是冲突不少、矛盾不断,人们将之描述为二者磕磕碰碰、彼此戒备的“遭遇”,而且这种并不理想的交往方式好像“尚未结束”。这样,基督教在中国过往历史和现实存在中就有了颇为复杂的处境,而中国人对基督教亦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心境,这在20世纪上半叶曾流行的话语“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中就得到了典型表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中重新全方位地与基督教“相遇”,这就产生了我们应如何面对有着23亿信徒、占人类总数约三分之一民众的基督教的问题。显然,对之加以抵制和排拒已是不可能的了,国际环境的变化则使我们有可能将以往冲突频仍的“遭遇”变为冷静、平和的“相遇”,将剑

拔弩张、两败俱伤的“对抗”变为相互理解、实现双赢的“对话”。这样,就需要双方能够促进积极的双向互动。而其中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则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要推动“基督教的中国化”?有没有可能实现基督教的这一“中国化”?对此,人们有着不同看法。其实,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基督教在中国有必要、也必须实现其“中国化”。这是其必然、必由之路而别无选择。基督教强调其“普世性”,但这种“普世性”并非抽象的,而必须通过其“地域性”来体现和实现。这就是基督教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时的“本土化”、“处境化”问题。其取舍将决定由此所涉及的一系列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问题的解决方式和不同结果。本来,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入乡随俗”、融入中国文化乃非常自然、不言而喻的,这种举措也曾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但因清朝时“中国礼仪之争”引发的政治及文化冲突,正常的宗教交流和传播中断,此后西方传教士乘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取胜、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之际而强势传教,并企图用“基督教占领中国”来让“中华归主”,遂使这一问题凸显,而且愈亦复杂、尖锐,留下了这一尚未克服的后遗症。很遗憾,西方基督教从整体来看对这一虽已过去却留有影响的历史缺乏认真反省和自我批评,从而保留着是推动还是防止基督教在华“西化”、“洋化”的张力。实际上,中国教内外有识之士均反对基督教对中国的“西化”,而要求其在华必须“中国化”。所以说,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对西方列强对华“文化侵略”的参与或卷入,基督教的“中国化”就有了特别的政治及文化意义,而当代基督教在华的正常生存与发展就是以消除西方侵华的历史影响为前提,由此也使基督教在中国必须“中国化”,以适应并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当然,中国社会也应对基督教整体有较为客观、全面、正确的理解,在中国文化接受并吸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先进文化因素时不要完全排拒基督教。在文化发展和建设的意义上,中国“海纳百川”的文化应该兼容、包容基督教,吸纳其文化的优秀元素而使我们自己的文化不断扩大和壮大。促进基督教的“中国化”,实际上也是让基督教融入中华文化的积极姿态和相应举措。我们当然会关注并重视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及作用,对之采取积极引导的态度。为此,我们也会回溯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找出正确道路。基督教有着在人类文化历史中两千多年的发展经验,对西方文化及其它相关文化的发展做出过积极贡献,因此,我们自然也希望基督教在与中国文化交往时会有更好的表现,这在当今的重新相遇中尤其重要。为了这种“相遇”及“对话”的顺利,为了使“基督教中国化”得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协商、组织了“基督教中国化研究项目”,并规划编辑《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该丛书将由多个研究系列组成,包括理论探索、历史研究、现状研究、人物研究、名著再版、史料汇编等;同时专办一份《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年度辑刊),其第一辑(2013)将收入中国大陆专家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代表作,随后将逐年精选汇集国内外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我们诚邀海内外志同道合的学术同行,携手合作,潜心研究,不懈探索,奉献佳作,以使这套系列丛书成为国际上最有参考价值的基督教中国化研究成果。这里,我们呼吁各界人士积极关注并参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并向对我们的研究项目加以大力支持和热心帮助的海内外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卓新平 张志刚

2013年3月21日于北京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绪言： 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既有重要学术价值、更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堪称世界第一大宗教。据新近估算,目前全球的基督教徒已近23亿,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其中天主教徒约12亿,新教徒约7亿,东正教徒近3亿,广泛分布于251个国家和地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拨乱反正,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大宗教都得以恢复和发展,其中尤以基督教信仰人数(主要是新教徒)的迅速增长最引人注目。于是,如何妥善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便作为“一道历史难题”、“一场现实挑战”和“一种未来抉择”而涌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一、勿忘过去：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道历史难题。以往研究表明,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基督教得以落足于中国文化土壤,历经“曲折的四传”,即唐朝时“景教”的传入,元朝时“也里可温”的传入,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相继传入。相比之下,后两次传入过程颇受中外学者的重视,但以往的研究倾向及其结论却明显存在很大的分歧。

譬如,有些学者主要倾向于考察,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为中西方文化交流——“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有些学者则主要

认为,传教士只是以西学、特别是近代科技知识作为手段,更何况他们所传播的西学旨在论证其教义与神学,而科技知识也不全是“先进的”,甚至有些是“过时的”。又如,有些学者主要倾向于认为,19世纪中叶基督教传入中国,是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入侵相联系的,这便使基督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在鸦片战争后长达百年的中华民族苦难史中主要扮演了丑恶的或负面的角色;有些学者则主要致力于研究,传教士和基督徒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教育体制、医疗卫生、慈善公益和新闻出版等所做出的大量积极奉献。

尽管以上两种不同的研究倾向不足以反映以往的研究全貌,更不能代表诸多相交叉或相调和的理论观点,但它们至少可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样两点:首先,对于这两段最受重视、也最有争议的传教史,以往的研究者之所以持有不同的倾向和观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背景和立场;其次,虽然这两段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致使人们的研究视角与价值判断也难免多种多样,但它们毕竟是发生在华夏大地的往事,已成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那么,我们能否在身份认同、学术立场、理论视野和研讨重点等关键环节上达成基本的共识呢?在我们看来,这样一种基本共识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学术同行,无论是学界的、教界的、政界的研究者,都理应站在整个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高度,亦即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着眼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就其主要的文化影响与社会作用,而对前述两段传教史做出理性而客观的历史评价。

国内外专家大多认为,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中国,并不简单意味着中国人又接触了一种外来的宗教;如果把天主教理解为当时仍在欧洲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与文化传统,它的传入则可视作中西方文化传统在信仰与价值层面上的“第一次相遇、碰撞、磨合”。^① 这场深层次的文化交流,起初虽以

^① 正如著名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指出,中西方文明传统之间的差异是一个特有的研究课题,而切入此项研究的最好办法,或许就是考察中西方文明在明末所发生的最早交流及其反应,因为此时第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最有文化修养的阶层建立了联系,这就在历史上使两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欧亚社会首次开始了真正的交流(参见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序”)。

传教士迎合、附会或修正儒家思想传统,引介西方人文科技知识为主要传教途径,也在客观上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双向传播、相互认知,特别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后来却因传教士内部引起的“中国礼仪之争”而不得不中止了。如果说这场“中国礼仪之争”及其结局,首次在历史上暴露了西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矛盾和冲突,鸦片战争后欧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再次涌入中国,则显然再次激化并愈发加深了西方基督教与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及其文化传统的矛盾冲突,以致使西方基督教与侵华战争、教案纠纷、非基督教运动、非宗教运动等,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忘却的民族记忆。正是就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作用和文化影响而言,“洋教”、“文化侵略工具”、“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并非‘中国的基督教’,而是‘基督教在中国’”等等,岂不注定成为近代中国基督教史里的“关键词”或“主要论点”,而部分传教士、特别是大多数基督徒为中国社会所做出的默默奉献,岂不注定沦为其中的“省略号”或“次要章节”。

以上扼要分析表明,基督教中国化所面临的主要历史难题就在于,由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矛盾冲突,而这一历史难题也正是基督教之所以要实现中国化的根本原因。但要充分论证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考虑一种流行已久的护教论观点,即以“基督教的普世性”来断然地否定其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尤其是中国化。关于这种质疑,我们可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研讨思路,从“普世”概念涵义、世界宗教史、特别是上述历史难题三个方面来展开辨析。

首先,就概念涵义而言,前述流行观点显然对“普世”概念缺乏辩证的理解,如果认为基督教信仰所传播的是一种“普世性的教义或精神”,那么,此种教义或精神必定是能够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中国化的;假若矢口否认这一点,基督教信仰便无所谓的“普世性”可言了,或用古汉语来严格释义,此乃并非“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其次,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千百年来几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其首要条件无疑在于,它们均能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或社会境

遇,并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民族化,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基督教何其不是如此?比较宗教学家、宗教现象学家斯马特(Ninian Smart)在其名著《世界宗教》里开篇就指出:当我们考察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传统时,切莫忘记它们的丰富多样性。以基督教为例,我们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可以发现,不同的文化都为这种宗教传统增添了特色,如乌克兰的天主教不同于爱尔兰的,希腊的东正教不同于俄罗斯的,德国的路德宗不同于美国的……^①由这段描述可推演刚才提到的问题: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基督教已然如此,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和社会处境下何其不能这样?

最后,接着以上发问来进而深究前述历史难题:为什么由西方传教士所传入的基督教信仰竟会与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呢?如前所述,这一历史难题始于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回首这段往事,我们不能不反思这样一种学术现象:为什么这场争论事过百余年后还有众多西方著名的思想家持续予以关注、纷纷发表议论呢?为什么这场争论至今仍是西方汉学、中国宗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重点或热门话题之一呢?此种迹象无疑表明,这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并非只是起因于“传教士内部的传教策略之争”,也并未终止于“罗马教皇与中国皇帝的权威之争”,而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西方宗教与文化传统观念的矛盾冲突”。

如果借鉴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对话、特别是宗教对话的晚近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这场中西方宗教与文化传统观念的矛盾冲突,除了以往研究者所着重考察的三点具体内容,即“能否祭祖”、“能否祀孔”和“上帝译名问题”,除了现已认识到的,冲突双方在文化、宗教、哲学、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其实还隐含有一个更深层的、具有价值导向作用的冲突原因,这就是来华传教士所普遍怀有的“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强烈的“排他性思维倾向”。这一深层次的冲突原因之所以很值得追究,就是因为它不仅作为“一种普遍的心态”,驱使各修会的传教士几乎都“自以为是”——只有他们所传播的“西方的基督教”才是“唯一的真宗教”,只有他们

^① 参见斯马特:《世界宗教》(第二版),“导言”,高师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所诠释的“西方的天主观或上帝观”才是“绝对的真信仰”，而中国人已有的其他任何信仰形式，无论“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哲学的”还是“宗教的”、“上层的”或是“民间的”，要么仅有“些许合理成分”，要么纯属于“偶像崇拜”甚至“迷信”。就此而论，我们可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更深刻地认识到：正因为明末清初以降的来华传教士几乎都抱有上述“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偏颇思维方式，才会在观念层次上致使“中国礼仪之争”以及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方宗教与文化传统的矛盾冲突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① 也正是就此而言，若不根除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排他性思维倾向，基督教便无法植根中国文化土壤，无法融入中国主流社会，无法真正实现其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或中国化。

二、正视现状：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

“基督教中国化”是一场现实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在中国大陆的迅速发展广受海内外学界、教界和政界的关注，并把大量疑难问题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综合近些年来的研讨情况，目前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所有疑难可归结为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将对整个中国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状况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近些年来，海内外学者围绕上述关键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论争，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观点。例如，有些专家学者指出，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国际背景或西方后盾”，即西方敌对势力依旧抱有“和平演变中国的

^① 或许有读者会觉得，这里做出的“全称判断”，即“明末清初以降的来华传教士几乎都……”是否显得有些绝对化了？在以往研究中，不少学者把利玛窦（*Mathew Ricci*, 1552 - 1610）的传教策略概括为“合儒、补儒、超儒”，认为后来的传教士若能认可并贯彻此种传教路线，或可避免“中国礼仪之争”。这种假设恐怕难以成立。如果把利玛窦《中国札记》和《天主实义》里的相关论点连贯起来，加以严谨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位所谓的“西儒”，实际上是以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天主观或上帝观”来全盘否定中国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并把“儒释道三教”贬斥为“中国人的全部迷信”。因此，从利玛窦的中西方宗教观来看，他可谓这里所要深究的“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排他性思维倾向”的始作俑者。关于上述文献分析，可参见张志刚：“‘宗教概念’的观念史考察——以利玛窦的中西方宗教观为例”，刊于金泽、赵广明主编：《宗教与哲学》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野心”，仍在实施“基督教化中国的战略”，这尤为明显地反映为培植地下势力，建立非法组织，不仅破坏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办教原则，而且影响了基督教的本真形象；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假如基督教在中国“一教独大”甚至“一教独霸”，势必恶化中国的宗教生态，有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主体性，影响社会和谐乃至国家安全等。以上观点深切地表露了“一种现实忧虑”，即在中国近代史上被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工具”的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不断改革开放、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今天，恐怕又会沦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工具”。

如果客观而全面地加以判断，上述忧虑或许有些言重了，但它并非没有一定的根据或道理。譬如，从比较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现有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都是“外来的”或“传入的”，而且近些年来不少学者经过考察或调研都有这样的感知，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基督教的信仰人数发展最快，但在整个社会上影响最大的要数佛教，在诸多民族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伊斯兰教，可值得推敲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国内外学界、教界和政界都很少有人强调中国佛教、中国伊斯兰教的“国际背景或国际后盾”，反而有不少人认为“基督教的中国化仍显得任重道远”呢？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至今尚未甩掉“洋教身份”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尚未像佛教和伊斯兰教那样融入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呢？再如，无论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国情来看，我们都要充分意识到，中国社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本价值理念在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而当今的中国基督教界，假如在教外人士看来不但仍然显得比较保守、相对封闭，未能真正融入中国主流社会及其发展潮流，而且其内部的“真假教会或真假信徒之争”看似愈演愈烈，这就让人不能不产生种种疑虑了，中国基督教内部在神学和组织上是否还残存着“唯我独尊的排他倾向”^①，这种信仰分歧的教会现状是否还配得上其“博爱的传统”，是否能被大多数中

^① 在此用“残存”一词，是想联系前面关于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心论及其排他性思维倾向的讨论，进而提出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即这种“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思维倾向，是否合乎“基督教的真精神”，或是否属于基督教信仰的本性呢？翻开西方教会史和神学史，我们可以察觉，这种偏颇的思维倾向，其实是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才得以抬头，并在西方中世纪的神哲学氛围下日渐盛行的。据此可以推断，这种偏颇的思维倾向，不但是西方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的产物，而且是西方传教士自明末清初后一直力图灌输给中国基督徒的。

自序

基督教与中国、或者说基督教在中国乃是两种伟大文化的相遇和对话,当然也是两种强势文化的接触和对比。这两种文化体系均有悠久的历史、复杂的经历和起落反复的发展过程。而且,二者各有所长,都强调其文化自觉和自我意识,并持守其基本精神理念和原则立场。因此,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并非一帆风顺、皆大欢喜的“相遇”,而是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遭遇”。虽然在千年之久的悠悠岁月中二者有过多次“相遇”,但延至今日,彼此真正的“相知”或“相识”却仍不多见,双方文化的承载者或代表者从整体而言则更少有其“心心相印”之境、“坦诚相见”之举。这样,基督教在中国就有了颇为复杂的处境,而中国人对基督教亦产生了极为微妙的心境。如何从基督教立场去了解中国文化,是批评和改造、还是认知和承认?这是历史上东来中国之基督教传教士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而如何从中国文化角度去了解基督教,是抵制和排斥、还是理解和吸纳?这则是中国人面对基督教而必有的表态和选择。在其相遇中,二者既有“对话”亦有“对抗”,既有“求同”亦有“存异”,由此构成了今日中国基督教及其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现状。“中国基督教”或“中国基督徒”实乃两种精神主体和两种文化载体的并立与相融。但它迄今并没有彻底、或较为理想地解决基督教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课题,亦未达成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理想共融和完美关系。其原因何在、其出路在哪里、其前景如何?这正是我们所关注的课题“基督教中国化”所要探讨、研究的。

有没有“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否需要基督教这一“中国化”？人们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议。基督教自称为一种“普世宗教”，在世界各地有着广泛的传播，自然也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其传入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涉及其“本土化”、“处境化”的问题。在这种过程中，基督教在其传播地区多有“本地化”还是“洋化”之争，从而也带来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复杂问题。坦率而言，这一问题在中国也没有根本解决，由此才出现其本质属性究竟是“基督教在中国”还是“中国基督教”之问。尤其当清朝“中国礼仪之争”以后西方传教士适应中国社会文化意识锐减，乘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取胜的优势而企图用“基督教占领中国”来让“中华归主”，这一问题随之复杂并尖锐起来。对于这种以基督教来体现的宗教文化之“西化”、“洋化”的趋势，中国教内外有识之士均表示反对，并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为了走出困境，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不少中国基督教界的领袖和知识精英进行了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的种种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实践经验。而且，自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批研究基督教思想文化的中国学人也投入到这种回归和反思之中，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着特别的关注。

在教外研究基督教的这些中国当代学者看来，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绝不是教会内部的“自说自话”，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关联。它不仅会影响基督教的在华命运，而且同样会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这也涉及教外众多中国人究竟会对基督教怎么看的问题，并由此引导其对待基督教的态度。这些年来自己学习和研究基督教的经历，也使我对基督教在文化和精神价值层面上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期盼，尤其可能是对其在中国的存在产生了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要求。不用讳言，我一方面希望中国当代社会应对基督教有客观、全面、正确的理解，让中国文化吸纳而不是排拒基督教，但另一方面也对基督教在华的现实存在和海外基督教会对华态度颇感失望。这自然会引起海内外一些教会人士对我的严厉批评或善意询问，而在当代中国话语中也可能成为一种“边缘”、甚至“另类”的表述。或许，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关系上当前仍存有的尴尬,自然也是在这一处境中其研究者所无法避免的尴尬。我们曾谈起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研究从“险”学到“显”学的发展和希望,但不可否认,这一研究也有可能再从“显”学而回归“险”学。这既与中西社会政治关系的发展相关,也与基督教会在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直接关联。基督教有着在人类文化历史中两千多年的发展经验,在与中国文化相遇中理应会有更好的表现。但这种“理想化”及其要求或许在教内外都会“和者甚寡”,从而产生“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不过,我仍认为,通过一种外在于教会的当代中国学人的视域来讲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历程,大家可能会找到另一种参照和比较,由此也能窥见其研究者在一双向张力和诉求中寻求对话、希冀达成沟通的心路历程。这种背负和努力在今天仍然是一种艰难而漫长之旅,但我们不能放弃其期盼、祈祷和祝福。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奇迹可能就会悄然而至。而分析、探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体验,展示、解释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吸纳或拒斥,以及在期待、盼望二者关系在未来能有一种理想走向中,我们则可以进而发现这种研究的意义,并体会研究者的志向和心态。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上,其对话的成功取决于一种积极的双向互动。

2003年2月18至20日,我承蒙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组(现已发展为神学院)卢龙光博士的邀请,主讲了第三届“庞万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讲座”。从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地域背景出发,我选择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求同与存异”这一讲题,与香港的朋友们有了较深的学术、思想和精神交流。这次演讲访问使我获益匪浅,分享到各界朋友们的许多宝贵经验、灵感和智慧。因此,我衷心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和卢龙光博士对我的邀请、感谢在讲座期间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并感谢庞万伦牧师夫妇(Rev. & Mrs. Herbert Pommerenke)的慷慨捐赠而使我们今天得以享有这一对话、交流的机会!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发展,香港基督教的存在处境和发展机遇与中国内地颇为不同,虽然其也面临着多文化的共聚和碰撞,却仍得以享受到一种跨文化的超越和得天独厚。但随着1997年香港的回归,我们会共同面

对一些相似的问题,我们的体验和体悟或许能获得更多的共鸣,我们的理解和认知也更容易达成某些共识。我想,香港基督教学术机构邀请我来参加这一讲座,正是表达了一种意向和姿态,即消除形成距离的“独白”,努力达成我们之间缩短距离或零距离的“对话”。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我对基督教这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信仰和文化体系亦已经有了约三十多年的体验和探究。自己在海外留学、进修和在国内研习、探讨的经历,使我非常佩服和尊重基督教所体现的一些信仰精神和文化因素,看到并体悟到其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建设及发展的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但与此同时,我也对基督教在社会政治历史中的一些失误,以及在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往中出现的缺陷深感遗憾,并对其教内仍有少数人士缺少这种反省精神颇为困惑。在此期间,我在基督教界也交了许多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大家虽然悟“道”不一,却对彼此能够心领神会。

这三个晚上我的讲稿包括三大问题,一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其中涵括三个层面,即“相遇的‘无意识性’和‘有意识性’”,“相遇的‘文化性’和‘跨文化性’”,以及“相遇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二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求同”,也涉及三个方面,即“求同中的翻译与解释”、“求同中的索隐与考证”,以及“求同中的对比与融贯”;三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存异”,其中同样分三个层次来展开,即“存异中的基督教特色”、“存异中的中国文化特色”,以及“存异中的中国基督教理解”。与这一讲题相关联,我在本书中另外还收录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三次对话”、“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及影响”这两篇文章,它们亦是基于相关学术讲演而撰写,因而与在此论及的主题有着直接和内在的联系。希望大家从上述内容中,对中国学术界有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讨论有所了解,从而能够进一步推进我们的相互理解,至少能在“和而不同”的氛围中达其真诚对话的融洽与和谐。由于自己时间有限,所欠文债太多,因而没能及时将讲稿整理出来,其修改补充和加工也拖了很久才得以收笔。我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卢龙光博士的